



严元章◎著



中国教育思想源流

ZHONGGUO JIAOYU SIXIANG YUANLIU

-092

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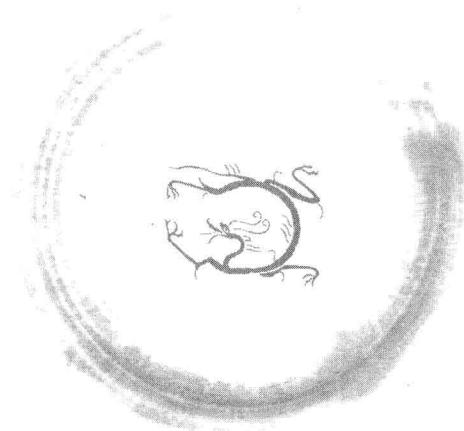
67854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全国优秀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

中國教育思想源流

ZHONGGUO JIAOYU SIXIANG YUANLIU

严元章◎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全国优秀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教育思想源流 / 严元章著. —广州：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12.4

ISBN 978 - 7 - 5406 - 9021 - 2

I. ①中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教育思想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G40 - 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7662 号

责任编辑：邹靖华

责任技编：吴伟腾

装帧设计：陈国梁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 - 15 楼)

邮政编码：510075

网址：<http://www.gjss.cn>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300 000 字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406 - 9021 - 2

定价：3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20 -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：020 - 87621848

自序

大概十年前，当《教育论》着笔之际，深觉要言不烦；因而行文简洁，无意于长篇的写作。稿成出版后，虽然颇为读者所欣赏；但亦有人以为，如果详明论述，读来就较易吸收。书业中朋友同此主张，认定涵义的发抒，对读者更为有利。因而接受好意，应约扩充篇幅。

就自我思考的进展来说，由此得以广泛推敲，抽引更多新意。而就民族经验的发扬来说，对先人时人的至理名言，也得以多方引用，而充实内容。这样做法，显然做得不错。

自1984年起，经五年苦工，还算不负期望，得到相当满意的成就——材料的配合融贯，食古能化，采今能通；言之成理，言之有物。终于构成“人生教育”的思想体系，可说是得来不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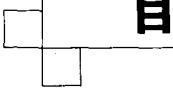
经此一番苦工，在教育思想的学术园地，可见中国绝不是一片虚无，反而有其独特的长处；与现代先进各国比美，也未遑多让。只是，我们的宝贵资源，深藏不露；分析综合，有待加工。愿大家共同努力！

本书原名，先是想用“教育论新编”之类；虽然形式可取，但是内容不明。改用双题，有违通例，且嫌累赘。最后决用标明内容重点的单题，即“中国教育思想源流”，名实得以照顾。

尹叶莘莘博士，曾就原稿提供高见；并约年青朋友代为抄稿，均此致谢！

1992年10月31日

改写于香港



目 录

自 序 (1)

第一章 主体论 (1)

孔子推崇人道，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，相互照顾，师生关系是柔性的师生兼顾。董仲舒高谈天道，划清尊卑贵贱界线，发展出刚性的上尊下卑的师生关系。我们应该以孔子为师，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，教师为教育的客体。学生是求教育者，不是被教育者，是求学者，不是受教者。教师不是施教育者，是助学者，不是教授者，是辅导者。

第二章 宗旨论 (27)

教育与人生同步，且与人生同归，教育原本便是人生教育，是对学生的人生的自然发展，作出顺应的人为加工，培养其成人成才。我们应上接孔子的流风遗韵，成人以养成正人为目的，进而以养成通人为理想。由于成才是人生所必需，我们只好违背先师“不器”的遗教，从理不从师。成才以养成专才为目的，进而以养成全才为理想。

第三章 材料论 (51)

过去两千多年，书卷是教育材料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，教育离人生越来越远，教育便成了书本教育。放眼天地，社会与自然

的范围之大、事物之多，万事、万物，都是取之不尽的教育材料的来源。我们应积极发展实事教育与实物教育，以补书本教育的缺陷。从万事、万物、万卷书中取材的原则应该是：贵精不贵多，贵新不贵旧，贵近不贵远。

第四章 方法论 (71)

在我们的教育遗产中最有价值的恰恰是教育方法，第一位名师孔子早就在教育活动中践行了，比如，启发、善诱、答问、论学等。这种着重辅导的教育方法，正好是方法论对学生主体论的照应。我们应积极倡导辅导的教育方法，废除惩罚，废除体罚，采用言教、物教、身教等方式，辅导学生自治，帮助他们成人，辅导学生自学，帮助他们成才。

第五章 体制论 (91)

人的所在便是教育的所在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构成了完整的人生教育体系，以满足人生的进步要求。家庭教育是人生的教育基础，是古往今来最普及的普及教育，应提高到与社会教育同等的地位。学校教育应把人生质素带入学制内，改变根据教育材料分级的方法，而按教育主体的教育阶段分为少年教育、青年教育、成人教育三级制。

第六章 师道论 (113)

教师是教学的人，是教人学的人，是教人学做人的人，以至是教人成人又成才的人。那是根据先秦儒家三哲的教育见解及其实践所得出来的，这是人生教育的说法。教贵因人，教贵因势，由学生的学出发，得到教师的教之善诱利导，而归结于学生的学。学与教构成一个又一个的循环，成人成才的期望便一步一步地达到。这便是为师之道。

第七章 效果论 (137)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种瓜种豆必须以瓜豆为主体，根据瓜豆的物性潜质潜能的自然发展，加以栽培才会有好收到。教育工作与

农业工作是大体一致的，教育希望出人才，就必须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规律与辅导的方法性规律，才会收到显著的教育效果。除了掌握教育规律，还必须探索教育技术的改进，人生教育的效果才会越来越高。

第八章 本质论 (163)

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学记》等经典著作中蕴含丰富的教育思想，依照其对教育本质的论断，大体可分为宽柔的农业性教育观和刚猛的工业性教育观。农业性教育观是以养、育为本质，把学生作为有生命的人看待，是客观的教育观，是正确的人生教育观。工业性教育观是以铸、造为本质，将学生作为无生命的物看待，是主观的教育观。

第九章 观点论 (191)

人生教育思想有四大要素，即宽、柔、养、育。《尚书》确立了“以宽立教”的教育思想，《中庸》对“敷教在宽”作出了明确的传承，之后陷于长期的沉寂及至闭塞，其间时有接续。在历代教育家当中，尽管很少谈到宽柔，却不少谈到养育，在他们的教育见解里，跟宽柔精神暗合的成分倒是很多，可以说，宽柔的观点已经成为古今教育家的共识。

附录

《教育论》香港版后记 (217)

《教育论》马来西亚版代序 (219)

正本清源，返本开新

——读《中国教育思想源流》 (221)

柔和之道：严元章教育思想精髓

——兼评《中国教育思想源流》 (225)



第一章

主体论

孔子推崇人道，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，相互照顾，师生关系是柔性的师生兼顾。董仲舒高谈天道，划清尊卑贵贱界线，发展出刚性的上尊下卑的师生关系。我们应该以孔子为师，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，教师为教育的客体。学生是求教育者，不是被教育者，是求学者，不是受教者。教师不是施教育者，是助学者，不是教授者，是辅导者。

从前旧社会的一些家庭里，摆有“天地君亲师”的牌位。随便看过去，那好像是民间对于统治权力的牵强附会；然而，就思路上推敲，把君亲师作单方面的那样尊重，那就很可能是阴阳家的礼教作品之一。只是，由于来历不明，资料缺乏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便不好判断了。

天地君亲师串联起来，显然是无限大的统治权力；如果分开来看，五方面的权力却差异极大——天是权力的唯一来源，天的权力便最大。至于高攀的师，根本没有权力可说。从前糊涂的说法，为君的是受命于天，是天之子，他的权力就有天那么大。

在家里，为父的相当于为君；因而他的权力也就有天那么大。所

以，古代的臣子通称君父为天。后汉出了班昭这位博学高才的女名人，竟然把夫也高高抬起来，抬到高与天齐的位置。

夫者，天也。^①

这是她追随当时所谓“礼教的大流”，传扬阴阳家意识，提倡男尊女卑，力言妇人必须屈服于丈夫之下；所写的《女诫》七篇，而在开宗明义的“卑弱第一”里，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写下来的。那样，为夫的也叨为君的光，得以高升到与君父看齐。就妇人本身看，除了当然要从父，又要从夫，甚至还要从子；班昭那三从的圈套，便把妇人的一生埋在礼教的坟墓里了——这样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还要办什么女学呢！

至于为师的，尽管得到推荐，有幸尾随君父的行列；却得不到名人抬举，没有为夫的那么好运气，因而高升不到天的位置。这就师生关系来说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此外，班昭活跃之前不久，在可说是钦定的三纲当中，也毫无师为生纲的意味附加上去。由此可见在天地君亲师的行列里，师只属于叨陪末座性质，与君、亲的权力地位绝不相称。为了整理礼教思想以至整个教育思想，这是应该分解清楚的。

二

公元79年，后汉章帝大会诸儒于宫中的白虎观；说是要详考经学诸家的异同；融会精义，调和学派。论辩经月，由班固（32—92）执笔，写成《白虎通义》一书，俗称《白虎通》。这可说是帝王利用学术讨论的开明形式，定下专制的礼教。

至于所谓通义的内容非常复杂烦琐，毫无意义的篇幅很多，可说是通义不通。属于专制礼教的成分，有夫可出妻，而妻不可去夫，等等。当中最重要的，便是“三纲六纪”里的“三纲”。这是帝王统治的基本教条，对教育思想有很坏的间接影响乃至直接影响。

^① 后汉书：《列女传·曹世叔妻》。

三纲的构思到底从哪里来呢？后人粗心大意，把这笔糊涂账归到儒家来，简直是含冤莫白。为了整理中国礼教思想以及教育思想，需要做一番工夫。

寻根究底，便明白三纲这吃人的礼教，不是出自儒家的孔、孟、荀，却是出自阴阳家，尤其是名为儒家实为阴阳家的董仲舒（前180—前115）。就他对汉武帝献策，主张重儒尊孔来说，可能是由于他的思想的两面性，时而儒家，时而阴阳家。不过，这里认定，他的思想主要是阴阳家思想。这有什么证据呢？除了他好以灾异论政，并以灾异行政，可作证据外；更有力的证据，便是见于《汉书》董传和《春秋繁露》的阴阳家思想。至于有人说他“宗奉孔孟，为汉代儒家正统”，是我们不能同意的。

三

董仲舒向武帝献策，一开口就以灾异论政，大谈天人感应：

臣谨案《春秋》之中，视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观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

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；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。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^①

后来他以殿灾论证，为武帝下狱当死，幸得赦免。从此他才“不敢复言灾异”^②，结束了他以灾异论证的废话连篇。

至于他以灾异行政，也是明确的事实：

仲舒治国，以《春秋》灾异之变，推阴阳所以错行。故求雨，闭诸阳，纵诸阴；其止雨，反是。^③

^① 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^② 同上书。

^③ 同上书。

如此论政行政，可说是极度的迷信；如此说法做法，都只属阴阳家，而绝不是儒家的。

说到他的基本思想，也绝不是儒家，而只是阴阳家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他在基本思想上不是阴阳家的，在论政行政上就不可能是阴阳家的。其实，他的阴阳家思想相当露骨；不过，后人失察，放过他了。在向武帝献策的时候，他已经说得很清楚：

道之大原出于天。

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^①

这样，他以天为道的大源，以阴阳为天道的大道——这到底是哪一家的思想呢？儒家的还是阴阳家的？传记是别人替他写的，也许写错了；现在不妨看看他自己写的。在《春秋繁露》里，他把阴阳家的思想发挥得直截了当。他说：

天道之常，一阴一阳。

阳尊阴卑。

阳贵而阴贱，天之制也。

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义，皆取诸阴阳之道：

君为阳，臣为阴；父为阳，子为阴；夫为阳；妻为阴。

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。^②

四

董仲舒高谈天道阴阳，划清尊卑贵贱界线，来奠定人与人的主要关系，替专制礼教写出底稿，迟早当为专制王朝所欣然接受。到了章帝，就利用经学的争论，把吃人的礼教制定下来，成为绝对的权力纲领，成

① 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② 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四十三、四十九、四十六、五十三各篇。

为极端的道德教条——这便是在所谓《通义》里，属于阴阳家礼教的三纲：

故《含文嘉》曰：

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”^①

这四字句的天条，简洁含文，好像并没有多大害处，只可惜绝对不嘉；发作起来，可以放出无穷无尽的杀伤力，所有邪恶的手段都用得着。那三纲的原意绝不是儒家的，而只是阴阳家的，尤其是董仲舒的；原文也都是阴阳家的——《含文嘉》是一本阴阳家书。大概在前汉年代，阴阳家者流，假托于孔子，附丽于经书，写了好几本纬书；其中的礼纬，说是有三本之多，《含文嘉》是其中之一。

班固的简单一笔，贡献不小。这就点明了三纲成文的由来，是由阴阳家书来的，并不是由儒家书来的。那么，三纲的形成，从头到尾，都是阴阳家的杰作；原意是阴阳家的，原文又是阴阳家的。把炮制三纲的责任清算起来，只能归到阴阳家，绝不能归到儒家；而礼教吃人的罪恶，便显然要由阴阳家担当。不错，儒家是重视礼教的；但儒家的礼教并不吃人，孔、孟、荀的礼教都不吃人。只有阴阳家的礼教，只有董仲舒的礼教，才是吃人的礼教。

五

阴阳家的礼教，跟着三纲后面的，便是六纪。这一套纲纪，是封建礼教的核心。三纲是统治的基本教条——由帝王统治，到家长统治，以至丈夫统治，都有绝大的权力。不过，六纪本身却没有权力可说，这跟三纲大不相同。对于人与人的关系，那许多不见于三纲的，便见于六纪；而在教育方面的师生关系，六纪是接触到了。这是第五纪的“师长有尊。”^②

^① 《白虎通义·三纲六纪》。

^② 同上书。

表面看来，这一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是可以勉强接受的；可是想深一层，问题却不小。因为那样一来，把师生关系套上了阴阳家那尊卑、贵贱的关系，滥用以至乱用起来，对学生会十分不利；多少年来，末流所趋，一些教师于有意无意之间，简直是把“师长有尊”看作三纲后面的第四纲——师为生纲；这样，教育工作可以随意做，甚至做到反教育去了。

其实，师长有尊，绝不等于师长有权——师长有尊只可说是要求学生尊敬教师，不是授权教师虐待学生。并且，教师要得到学生的尊敬，自己又该怎样对待学生呢？如果礼教学生尊敬教师，礼又该怎样教教师爱护学生呢？对于师生关系，问题的提出以至问题的解答，并没有什么高深之处，一般教师该是可以理解的。只是，由于受到专制礼教的绝大影响，大家有如班昭那样，追随所谓“礼教的大流”，弄得昏头昏脑；于是，为师的看到君父的统治臣子，恍惚以为自己也可以照样统治学生。从而，为师的对学生管教，如同对学生统治，教育工作就变质了。

前面提到，师长有尊而无权；统治是要有权力的，如果师长无权，怎么可以统治学生呢！在分析天地君亲师的时候，已经说明，师与君亲的地位绝不相称，师是没有权力地位的。此外，三纲是统治权力的来源，但师长并不入于三纲；师长虽然入于六纪，但六纪却不是统治权力的来源。那么，师权是没有根据的，师权是不能成立的。说到底，师权就算有什么了不起的根据，总是已经过时的封建残余，不是早就应该作废了吗！

六

到了这里，为了礼教思想以至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，还有最后一步的工夫要做，这便是对天道议论的分解。早在公元前六世纪，在董仲舒讲阴阳家的天道之前四百年左右，郑国的主政大夫子产（前？—前522），已经拒绝接受那迷信盲从的愚见，以及那以天人的吉凶祸福，来预言治乱兴废的胡说。他谦虚得体地说，自己只懂人道，不懂天道；因为人道近，天道远——他反问：自以为懂得天道的人，又怎么会懂得呢？他的名言是：

人道迩，天道远，非所及也——何以知之？^①

当时有三四位大夫，以郑国火灾事，与子产论政，子产一概不同意。他认为讲天道的人，哪里懂得天道，只是口多多吧；不过，多讲几次，也许会有一次讲中的。

这位活跃而明智的政治家，大概死于孔子30岁的时候，而为孔子所赞美；他的正确思想，拒天道，主人道，对儒家思想的发展，也许有重大的影响——孔子的仁道与荀子的天论，跟子产的思想都可能有承传的关系。孔子的人道思想，是一以贯之的仁道，这里不用多说。至于荀子的《天论》，可说是富有科学性的思想，实在是先见之明，把阴阳家的天道废话扫得干干净净。

七

《天论》是荀子书的一篇，从“天行”讲起：

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；应之以治则吉，应之以乱则凶。

治乱，天耶？

治乱，非天也。

这样，国事的一治一乱，由人不由天；那只是人为，而不是天意。

星坠，木鸣，国人皆恐。

曰：是何也？

曰：无何也。

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

^① 《春秋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；原文“人道迩”在“天道远”之后，现试调前。

怪之，可也；而畏之，非也。

这样，所谓灾异的事件，是自然的变化；与人事的祸福，没有关系。所以，我们对灾异恐惧，是错误的；对灾异觉得奇怪，而加以探索，那就对了。跟着，《天论》进一步指出：

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；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！

既然治乱与天无关，而灾异又与人无关；那么，人该怎样对待天呢？《天论》认为，与其老是想着天的伟大，不如把天看作物质而加以制裁；与其服从天而对天歌颂，不如制裁天而加以利用。这可说是人对天应有的正确态度。此外，荀子总结道，把天人关系分得清楚，便说得出是“至人”了：

明于天人之分，则可谓至人矣。

八

我们花了不少时间，去替中国的人生思想，做寻根究底的工夫；这是为了中国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，不能不作的深一层的推敲。那就是由子产的肯定人道，同时否定天道，到孔子的发扬人道，以至荀子的扫除天道。由此，就在公元前的几百年间，拓展了中国思想那明智而正常的道路。这原是顺理成章，值得后人虚心支持，继起发扬光大。

谁也料不到，荀子谢世后百多年，跳出了一位阴阳家的董仲舒，把天道、阴阳、尊卑贵贱的圈套，套上主要的人事关系；由此铺排邪恶的三纲，然后叫人求之于天。这么一来，三纲是天赐的，不是人写的，不是董仲舒搞出来的，他只是替天传道罢了。一派胡言乱语：首先，借重天威，要人对天屈服；跟着借重君权，要人对人屈服。层层压迫，处处束缚。由三纲以至三从，乃至依附三纲的六纪，不外是阴阳家要推出他们的礼教，来建立专制的权力结构。

显然，阴阳家的礼教与儒家无关，更与孔子无关；所以，这里必须

替儒家翻案，必须替孔子翻案，好把后人在中国思想上，搞乱了的那笔糊涂账，从头到尾清算了一次——阴阳家的账归于阴阳家，不是儒家的账就从儒家剔出去。这应该怎样做呢？一种消极的做法，便是打开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这三本儒家的大作，看看里面有没有阴阳家的糊涂账；如果没有，便是儒家不糊涂，只是阴阳家糊涂。不过，这还不是最好的做法。最好的是积极的做法，是从儒家那三本大作中，找出类似以至相同的题材，且看儒家说过什么——儒家跟阴阳家同流合污还是儒家清白自立，而远比阴阳家高明，乃至儒家早已面对前期阴阳家的谬论，直斥其非，并且提出精彩的见解了？

九

对于人与人的关系，儒家有一套人道的构思，阴阳家却反过来搞什么天道；儒家的人道构思，是要双方兼顾的，阴阳家却不顾对方。就以最敏感的君臣关系为例，孔子（前551—前499）就带头说过。他曾对鲁定公这样说过：

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^①

这样“君礼”、“臣忠”的相互关系，已经相当开明；孟子（前390—前305）对齐宣王就说得更开明：

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^②

至于孟子听说的五伦，涵义虽然没有那么清楚，不过还是双方兼顾的：

^① 《论语·八佾篇》。

^② 《孟子·离娄章句下》。

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^①

而荀子虽然只说到三伦：

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。^②

但是跟孟子所说的，大体上完全相同，还是双方兼顾的。这是孔、孟、荀的思路贯通与思想一致，成为儒家礼教思想的支柱。也就成为礼教结构上，儒家与阴阳家的根本差异所在。

此外，要求臣子对君父盲从的谬论，大概在前期阴阳家之间已经相当流行，而引起荀子简明地加以驳斥：

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——人之大行也。^③

一个人如果能这样坚持道义，作为臣子抗拒君父无道无义的根据，实在是了不起的行为；所以，荀子跟着便赞美那样的行为，是重大的乃至伟大的。这么高度的赞美，可说是并不过分。因为由此便可以冲击罪恶的三纲意识，从而化解愚忠愚孝的阴阳家邪念。至于三纲中末了一纲的瞎说，大概在荀子的年代还没有出现，所以他没有提到。为了妇女的解放，以及三纲的全部推翻，我们不妨在这里替他补一笔：

从理不从夫。

那么，阴阳家推出的吃人礼教，一扫而光；同时为不吃人的儒家礼教，消除污染。

①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上》。

②《荀子·天论》。

③《荀子·子道》。